



海涅詩選

海 涅 詩 選

馮 至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海 涅 詩 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489 字数 84,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张印 6 $\frac{7}{16}$ 插页 9

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1962年9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63001—70000 册

定价 (4) 0.77元



海涅 1842 年 像

薩木尔·笛次(Samuel Diez)繪

亨利希·海涅

1 “我一向忠实而正直地执行了这个职务”

海涅和他的作品一向受着两种极不相同的待遇：一种是尊敬和爱好，一种是诬蔑和歪曲。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爱护，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的推崇，他的作品在苏联的普遍流行，德国反法西斯的优秀作家如魏纳特(Weinert)、布莱希特(Brecht)等人卓越地继承了他的文学传统。在中国，鲁迅在1914年就用文言译过他的抒情诗，郭沫若在写他第一部诗集“女神”的时期，曾经说过，海涅对他的诗歌创作是有影响的；此后，海涅的抒情诗在中国青年中得到相当广泛的爱好；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海涅的政治諷刺詩被譯成中文，詩中對反動勢力本質的徹底而尖銳的揭發，有許多地方正符合當時中國的情況，我們可以說這些詩也曾參與了中國人民的鬥爭。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國的沙文主義者、偽善的資產階級學者、歐美進入帝國主義時期的反動詩人們，則用尽心機來誣蔑他、歪曲他。他們不是否定，就是設法貶低海涅的價值；不是用他早年的抒情詩來遮蓋他晚年更為成熟的政治詩，就是把他活力充沛、富有戰鬥性的政論文字從文集裏刪去，說是時代過去了，這些“應時”的文章已經失去它們存在的意義。到了納粹當權時期，因為海涅正直而深刻的諷刺處處打中納粹分子的要害，他們索性變本加厲，向海涅猖狂進攻，焚燬他的作品，搗碎在德國本來就為數很少的海涅紀念碑，要把海涅的名字從歷史裏勾消。但是海涅的詩已經成為人民共同的財產，有的到處被人歌唱，存在在許許多多的歌本裏，匪徒們無法消滅，只好在這樣的歌——例如“羅累萊”——的下邊不說出詩人的姓名，代之以“無名詩人”的字

样。就是不久以前在西德，有人到了海涅的故鄉杜塞尔多夫，走到海涅降生的那所房前，把門敲開，和房裏的主人提到海涅，得到的回答是：“这位先生不住在這裏。”①

這兩種極不相同的待遇很明顯地說明了，什麼人愛他，什麼人恨他。海涅自己在1832年早已說過：“我的敵人的憎恨可以充作我一向忠實而正直地執行了這個職務的保證。我將顯示出，那種憎恨我永久是分所應得的。我的敵人絕不會錯認了我……”②海涅在這裏所說的職務，是一個作家要為人類的和平、幸福、自由而奮鬥。誠然，他的敵人沒有錯認了他，他們用他們的憎恨給海涅的忠於這個職務作了保證。但是在另一方面，同樣給海涅作了保證的，是一切人類進步事業的參加者，如今在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裏，包括海涅祖國的一部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內，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認清海涅是十九世紀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詩人，人類解放的戰士。他的作品，過去敵人們處心積慮要抹殺、要消滅的，今天却更為燦爛地放出光芒，

我們現在讀它們，有許多地方像是墨瀋未乾、剛剛寫成的一般，因為它們仍然具有豐富的現實意義，它們的矛頭所向仍然是我們今天共同的敵人。

2 从玫瑰夜鶯到劍和火焰

亨利希·海涅於1797年12月13日生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一个貧窮的猶太商人的家裏。杜塞尔多夫在1795年被法蘭西共和國的軍隊佔領，法國的軍隊給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帶來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根據他們的法典，一般市民獲得了一些經濟上和社会上的權利，一向受人歧視的猶太人也從猶太區裏解放出來，享受平等的待遇。這些措施在工業較為發達的萊茵區是受到普遍歡迎的。在這一點上，“拿破崙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者，革命原則的宣示者，舊封建社会的破坏者”^①。1813年拿破崙失敗後，杜塞尔多夫歸普魯士統治，人民已經獲得的一些權利又被剝奪，受着殘酷的壓制。從這裏我們可以理解，海

涅為什麼很早就那樣嚮往法國的自由精神，並且有一個時期崇奉拿破崙，而對於普魯士始終是深惡痛絕的。

海涅的父母希望他們的兒子也做商人，1816年把他送到漢堡他的一個有錢的叔父銀行家所羅門·海涅那裏，請求他的叔父資助他建立一個商店。但是海涅對於經商不感興趣，商店開張不久就倒閉了。他在1819年入波恩大學學法律，六年後在哥亭根大學完成了博士考試，結束了大學的學習。

海涅從1817年起就發表詩歌創作。這時德國正處在封建復辟時代，全國三十六個大大小小的邦，只是形式地成立了一個德意志民族各邦的聯盟，在梅茵河畔的佛蘭克府設立了聯盟議會，以奧地利代表擔任主席，處理各邦的共同問題。但這個議會是個空頭議會，它在鎮壓人民、迫害進步力量、箝制言論自由上是一致的，遇到邦國之間的利害衝突，它就失去了任何約束的力量。關於那些君主，恩格斯說過：“哪一個時代都沒有比1816—1830年間國王所犯的罪行更多的了。

幾乎那時的每一個君主都應該處以死刑。”他說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是“最無用、最可惡、最該死的國王……”^④這足以說明那些統治者的昏庸殘暴。而當時德國的文藝界，除了年老的歌德以外，大部分的浪漫派詩人都是躲避現實，緬懷過去，美化中古的封建制度，給這些君主點綴太平，為虎作倀。

海涅是在浪漫派的影響下起始寫作的，但是他不久就看出德國浪漫派文藝的虛弱無力。他在1820年寫的“論浪漫派”裏提出他的要求，他說，德國的文藝女神應該是“一個自由的、開花的、不矯揉造作的、真正德國的女孩子，不應該是蒼白的尼姑和誇耀門閥的騎士小姐”。

在海涅早期的抒情詩裏，我們好像處處看到這樣一個“自由的女孩子”在活潑地跳躍、歌唱。詩人用極流利的人民的語言、和諧的音調，把自然界裏的玫瑰、夜鶯、百合、蝴蝶、星辰、月光、日出日落，以及海上的波濤和晚間的霧靄，都融化在他的簡潔有力的詩歌裏，個人的情感和外界的事物得到美妙的融合。詩裏充溢了對於生

活的熱愛，其中雖然也摻雜着憂鬱和悲哀的聲調，但這是真實的感受，和浪漫派詩人們那種迴避現實，沉醉在死和過去裏是迥然不同的。這時作者還年輕，他的快樂和痛苦多半局限在個人的遭遇上邊——主要是他和他叔父的女兒阿瑪麗不幸的愛情——，可是像“每逢我在清晨……”那樣的詩已經不只是個人的哀樂，而是使人感到當時德國的鄙陋狀態，以及這狀態所給予一些人的不幸了。

在他活潑、佻健、音調諧和、色彩鮮明的抒情詩裏，也顯露出海涅獨特的嘲諷的風格。他對於社會裏的庸俗虛偽、浪漫派詩人非現實的夢幻，常常給以有力的嘲諷。他有時故作正經地描述夢幻，使讀者覺得他好像真是沉迷在這夢幻裏一般，但是寫到最後幾句，却出人意外地指出面前的現實，把那空中樓閣完全推翻。這是海涅在早期著作中很喜欢运用的一种手法，恩格斯在“詩和散文裏的德國社會主義”裏說得好：“海涅是把市民的夢幻故意擰轉到高处，為的是隨後同樣故意地使那些夢幻跌落到現實裏。”^⑥ 抬得高，

跌得重，这是足可以致那些非现实的夢幻以死命的。如“海中幻影”就是一个顯著的例子。

这些詩，最初是作为“青春的苦惱”、“抒情插曲”、“歸鄉集”、“北海集”等詩組先後發表的，1827年被收在一起，叫作“歌集”。“歌集”出版後，受到廣大讀者的欢迎，成为德國詩歌史裏的一件大事，直到海涅逝世前，再版了十三次。其中有許多首一再地被音樂家配上樂譜，被廣大的人民歌唱，成为人民自己的歌曲。

比詩較晚，海涅也从事散文寫作。从1824到1828年他寫过四部著名的遊記。在这些遊記裏海涅以他犀利的筆鋒更進一步發揮了他諷刺的才能。他在“哈尔次山遊記”裏揭發了社会裏种种虛偽、愚陋和不合理的現象，刻画了德國反動統治下的市僧們、奴僕們、狹隘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教会裏的醜态；他對於勞動人民如礦工、牧童，對於美麗的自然，都給以熱情的歌頌。1827年，他到英國旅行，他走到这當時資本主义最發達的國家，擴大了眼界，立即在倫敦外表的繁榮的後边看到勞動人民悲慘的生活，狄更斯在四十年代所描

寫的大城市中貧民的苦难，海涅在1828年的“英國斷片”裏已經接觸到了。寫到這些問題時，他的文筆也就從嘲諷轉為控訴。他同時也看到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他說：“雖然我們也為資產階級的不平等而抱怨……可是我們的眼睛總是往上瞧，我們只瞧見那些騎在我們頭上和利用他們的特權來侮辱我們的人；我們在抱怨的時候從來也不往下看，從來也沒有想到把那些還站在我們腳底下的人拉到我們的身旁來。事實上，當這些人往上擠的時候，我們甚至还覺得討厭，向他們迎頭打下去。”^①後來他在“從明興到熱那亞的旅行”裏更鮮明地表明了他的立場：“我實在不知道，我是否值得人們將來用桂冠來裝飾我的靈柩。……我從來不特別重視詩人的榮譽，人們稱讚或責備我的詩歌，我都很少在意。但是你們應該把一柄劍放在我的棺上，因為我是人類解放戰爭中一個善良的戰士。”

海涅對於德國落後狀態毫不容情的諷刺，對於反動勢力正中要害的進攻，以及德國當時對於猶太人的種族歧視，使他在他的祖國遭受到各種

各样的誣讒和迫害。他大學畢業後，曾經想尽方法要謀得一个職業，但總是落空，致使他不得不忍辱含垢地从他叔父那裏求得經濟上的帮助。“歌集”的出版受到廣大羣众的欢迎，得到的稿酬却是極低微的。1830年，在他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海涅正在北海的黑尔郭蘭島上养病，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得到鼓舞，看清自己的方向，他在8月10日“黑尔郭蘭通信”裏寫道：“我現在知道，我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必須做什麼……我是革命的兒子……遞給我琴，我唱一首战歌……語言像是燃燒的星辰从高处射下，它們燒燬宮殿，照明茅舍……我全身是欢悅和歌唱，劍和火焰。”他在这样的兴奋中寫出“我是劍，我是火焰”的革命頌歌，最後他決定離開德國，到巴黎去。

3 “和新的同志們登上一隻新船”

海涅在1831年5月到了巴黎，除了1843年和1844年兩次短期回到漢堡外，他再也沒有看

見他的祖國。

他在巴黎受到法國進步的文藝界和思想界的歡迎。他和作家巴爾扎克、喬治·桑、大仲馬，音樂家蕭邦，以及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信徒們來往。在三十年代初期，海涅本人也是信奉聖·西門主義的。

他在 1843 年 5 月寫過一首題名“生命的航行”的詩，表達他僑居巴黎的心境。詩裏說，他从前同一些朋友們共同坐在一隻小船裏歡笑歌唱，但是船撞碎了，朋友們都不善於游泳，在祖國沉沒了，暴風却把他吹到巴黎的塞納河畔；他和一些新的同志登上一隻新船，又是一片新的歡笑和歌唱；詩裏一再反覆這兩句：故鄉是多麼遠，心是多麼沉重。——事實上，他的心始終沒有離開祖國，他密切注意着德國國內發生的一切事件。他給德國奧格斯堡的報紙寫通訊，報道法國情況；也給法國的報刊寫關於德國文學、哲學、宗教的文章。他認為，促進兩國文化的交流，使兩國人民互相了解，是他的重要任務之一。

海涅在青年時把德國反動的浪漫派文學比

作苍白的尼姑，因为它缺乏真实的生命，如今他衡量它的價值，則站在人民的立場，問它在社會政治上起什麼作用了。他在論德國文學的論文裏——後來收集為“論浪漫派”一書——特別指出，文學應該與實際的生活結合，與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一致。他說，有些浪漫派詩人並不是“生活的詩人”，而是“死亡的詩人”，所以人民並不愛他們，也不讀他們。他們只給一些封建君主充當無聊的助手。他並且用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比喻詩人，“像是巨人安泰一般，當他的腳接觸到大地母親時，他永久是不可戰勝地堅強，只要赫勾力斯把他誘到天空，他就失却力量：詩人在他不離開現實的大地時，是堅強有力的，只要他空想地在藍色的空中翱翔，也就變得軟弱無力了。”

他在關於德國宗教和哲學的論文裏——後來收集為“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嘲笑了康德的“自在之物”，諷刺了費希特的“自我”創造世界的學說，他向唯心主義作了鬥爭。但他也指出，德國哲學是下一代革命實踐的準備，正

如恩格斯在“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裏所說：“正像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一樣，在十九世紀的德國也是由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導言。”恩格斯並且在這一段裏提到海涅：“然而不論政府或自由黨人都未能覺察到的一點，早在1833年至少有一个人已經看出來了；誠然，这个人不是別个，而是亨利希·海涅。”^⑦——这种思想，後來海涅寫在題名“教义”的那首詩裏。

法國1830年的七月革命，摧毀了舊貴族的統治，迫使狂暴的查理十世退位，但是享有勝利果實的並不是人民，而是在人民起義時怯懦地躲在地窖裏的大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号称“市民之王”的路易·腓力普。關於資產階級對於人民的欺騙，海涅在1840年出版的“路德威希·別爾納”(Ludwig Börne)裏寫道：“這是一個已經一向如此的歷史了。从远古以來，人民不是為他自己流血受難，而是為了別人。1830年7月，人民為資產階級戰鬥，取得了勝利，這個資產階級跟那個貴族階級是同樣地沒有用，它以同樣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貴族……通過這個勝利，人民毫無所得，得